

# 木兰溪畔的龙眼林

□易振环



立秋刚过，本地龙眼就陆续上市，市区多家农贸市场已开始售卖鲜果。每到采摘季，龙眼成了寻常百姓餐桌上的“常客”，让我想起地处木兰溪畔华亭镇云峰村的“龙眼海”。

那是一个以“龙眼海”命名的乡村公园，我曾多次游览。登上六角亭，扑面而来的龙眼树绵延连片，郁郁葱葱，织成一片绿海。一株株龙眼树枝杈横斜，硕果累累，串串低垂。一粒粒浑圆饱满的龙眼，在最炽热的光里酝酿最深沉的甜蜜。

木兰溪畔的龙眼林，是莆田龙眼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关于莆田龙眼的最早记录，可追溯到唐乾宁二年御史黄滔《黄岩寺碑铭》里写道的“嘉树比栴”，说的是东峰庙那两株龙眼树。彼时它们已亭亭如盖，在晨钟暮鼓里结出圆如弹丸的果实。明代黄仲昭编纂的《八闽通志》记载：“龙眼树似荔枝，而叶微小，皮黄褐色。荔枝才过，龙眼即熟……兴化府郡人植之亦多。”这印证了当时的兴化府（即今莆田）广种龙眼，也就是说存有龙眼林。

木兰溪流经莆田大地，滋养了漫山遍野的龙眼林。莆田地处我国龙眼栽培适宜区

的北缘，日照充足、雨量适中、温差较大，为糖分的积累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。因此，与其他产地相比，莆田的龙眼具有果肉厚、质脆香甜、纤维少等特点，口感上乘。可以说，是桂圆中的佼佼者。

龙眼是莆田四大名果之一，盛产于木兰溪和萩芦溪下游一带，以华亭镇、盖尾镇一带居多。千年来，莆田人精耕细作，尝试推行良种良法。从“乌龙岭”到“水南1号”，从“油潭本”到“松风本”，从“立冬本”到“四季蜜”，品种改良的努力从未停歇过，栽培技术在全国遥遥领先。据媒体报道，莆田现有80多个本土龙眼品种。如普明庵本、红核仔本、秋分本、乌壳本等，这些品种壳薄、肉厚、汁多、核不大，适于鲜食；乌龙本、油潭本等颗粒大、产量多，适于加工焙制或榨汁熬制。还有“醃核”、白核、血丝龙眼等稀有品种，堪称珍品。如今，在村庄的房前屋后、田边园角、河畔山间，随处可见龙眼树及成片的龙眼林。它们似乎在续写一部关于龙眼的编年史，将甘甜的基因刻进壶山兰水。

“一个小胖子，藏着黑珠子，剥开黄身子，露出白肚子。”这是小时候曾祖母让小孩猜的谜面。形象的谜底，让我们对龙眼这种水果有了最初的认知，甚至垂涎三尺。由于山区冬季寒冷，不适宜栽植龙眼，所以村里几乎没人栽植龙眼。仅有村道旁一株不知名的龙眼，成了不少村民特别是孩童眼中的“香饽饽”。尽管每年挂果甚少，孩童们却巴望着主人分几粒龙眼，让大伙过把“嘴瘾”，解解馋。那时，我心想村里要是那片龙眼林该多好，小伙伴们就会有口福。还好，我家有个来自涵江的挑工朋友，他不定期挑来海蛎等海产品进村销售，八月份会带来少许龙眼，给我们尝尝鲜。咬破果壳的瞬间，汁水顿时迸发，满嘴果香四溢，甜入心底。嚼罢半透明状的果肉，我还不忘记将乌黑的果核置于水瓮底座旁的湿土处，期盼生根发芽，然后移栽长成林。

龙眼林的烟火气，总散发着香甜，因为每粒果实都蕴藏着大自然的恩赐与果民的辛劳。鲜嫩龙眼的吃法多样，多数情况下直接食用。其不仅能带来甜蜜的味蕾刺激，还能为身体补充能量，缓解疲劳。李时珍盛赞其“开胃益脾，补虚长智”。

龙眼除鲜食外，通常用古法烘焙制成桂圆干。古法烘

焙须经“摇沙”等九道工序，这是兴化桂圆特色工艺，可提升桂圆干的品质。其间，焙灶前的老匠人须用木耙翻动“摇沙”后的龙眼，因为火太旺会焦，太弱则慢。那温热的炭火，烤的是果，也是耐心。夜里守灶时，他们会讲起宋徽宗那年龙颜大悦赐名“桂圆”的故事和成为贡品的由来。明弘治年间，仙游、莆田两县每年进贡500公斤桂圆干。那些带着别样的木炭香的兴化桂圆，从木兰溪码头出发，直达紫禁城，甚至沿着海上丝路，向世界传递“香甜名片”。

当然，龙眼树的馈赠远不止果实。龙眼花蜜比荔枝蜜更醇厚。龙眼木坚硬如铁，适合雕刻，莆田很多木雕工艺品就以龙眼木为材质，作品历经岁月磨砺而泛红，像把年轮酿成了蜜。即使是龙眼树根，也成了“抢手货”。这不，在匠人的刻刀下，虬曲的疤节也能变身“千年雕魂”。老木匠说，“几代人用都不会烂”。从花叶到根枝，龙眼全身是宝：叶可入药，花能酿蜜，核能治狐臭。明代莆籍大艺术家宋任在《桂圆诗》中描写：“圆若骊珠。赤如金丸，肉似玻璃，核如黑漆，补精益髓，润渴扶肌，美颜色、润肌肤，多种功效，不可枚乘。”

木兰溪的水，把龙眼林的甜蜜酿成了乡愁。在百姓眼里，龙眼不仅是一种水果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文化的象征。在民间，龙眼还是吉祥、丰收和团圆的化身，也常被作为礼物赠送亲朋好友，寓意幸福和美好的祝福。如，桂圆与红枣、花生、莲子组成“早生贵子”，那是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。若是在游子眼里，桂圆干是“看得见的兰溪水”。

木兰溪的水，让龙眼林焕发新机。近年来，我市积极推动龙眼产业的转型升级，助力乡村振兴，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捧起“甜饭碗”。其中，天桂（福建）食品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莆田首个桂圆现代产业园，开启了讲好“小龙眼大能量”产业故事的好头。

兰水淙淙，龙眼林的绿在蔓延，如波澜起伏跌宕。那些挂在枝头的龙眼，无疑是兴化大地令人自豪的果品，更是我们自信满满奔向未来的精彩气息。穿过林间的阵阵清风，仿佛在重复着那句“兴化桂圆甲天下”的激荡，延续人与树、人与水、人与时光和谐的相守和共生。

## 龙眼树下的岁月长歌

□陈俊洪

阳光和煦的日子，与妻子回老家携手漫步，脚步总会不由自主地迈向田厝村那片熟悉的龙眼林。这个偎依在西天尾镇三山脚下的村落，最丰沛的绿意与最深沉的守望，都凝聚在这片广袤的龙眼王国。葱茏枝叶层层叠叠，宛若大地精心绣制的绿绒毯；每一棵虬枝盘结的龙眼树，都像沉默的长者，粗糙的树干刻满风霜，也默默见证着我们从青春年华走到鬓染霜白的悠长岁月。

我们的故事，就生根在这片绿荫之下。记忆里，总有一条清澈的小沟渠蜿蜒穿村而过，那是东圳水库引来的活水，滋养着世代依龙眼而生的百姓。也正是在这条沟渠边，我第一次遇

见了她。那年夏天，龙眼挂满枝头，她穿着碎花裙子蹲在沟边洗手，阳光透过叶隙在发梢跳跃。我鼓起勇气上前搭话，她抬起头，眼眸清澈，羞涩一笑，便漾开了我的心湖。后来，我们无数次并肩走过那条常被沟水浸湿的小路：曾指尖相触分食同一颗龙眼的晶莹剔透果肉，甜汁沾在指尖都舍不得擦；也曾为她捞起不慎落水的布娃娃，看着她破涕为笑时眼角的水光，比溪涧更清亮。那些点点滴滴，都带着龙眼的清甜，在记忆里鲜活如初。

盛夏是龙眼林的生命华彩时刻。一串串龙眼换上黄褐或浅金色的外衣，沉甸甸地压弯枝桠，如绿波上浮动的金色光点。我们的孩子，也曾在同样的龙眼树荫下蹒跚学步，稚嫩的笑声、追逐的叫喊，仿佛至今仍于枝叶间清脆回响，与蝉鸣交织成岁月的和弦。

我曾天真地以为，这片绿荫会永远为我们遮风挡雨。然而，时代的画卷总在不断铺展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蝉鸣声里也融入了城镇发展的交响。一个黄昏，我们再次漫步到龙眼林边，妻子停下脚步，目光越过稀疏的林木梢望向远方拔地而起的楼宇，眼神里盛满对这片龙眼林子的深深依恋。她轻抚着身边龙眼树粗糙的树干，像在我耳边，又像在自语：“这陪伴我们成长的孩子，未来会怎样融入这新的风景？”

“环境在变，村庄在发展。”我看着她的眼睛缓缓说道，“但你看这树，叶子会落，果子会摘，可只要根还在，来年春天，它照样会发出新芽。”

回望过往，所有逝去的时光，都仿佛被这片龙眼林过滤、沉淀。在那些沉默坚韧、或存或逝的龙眼林的长久注视下，这份平凡岁月的真情，愈显其醇厚与珍贵。它在心中深埋，坚实的内核里包裹着最甘甜的过往，也蕴藏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。

这希望，如同深埋土中的龙眼核，静待着破土而出的新绿，续写着属于这片土地，也属于我们生命的生生不息的诗行。



## 南日岛散章

□林落木

### 码头

渔船摇晃，码头在眺望  
我习惯地沉默无语  
我习惯地略感疲惫  
港湾动荡不安  
令我习惯地想起  
远行与回归  
而你习惯地觉得自己  
经常身处其间

### 南日岛的早晨

这茫茫的海水  
这大海的一处蜿蜒曲折的栖息地  
被囚禁的粗犷的肉身  
布满了茫茫的阳光  
我听见白天与黑夜  
继续着昨天无边际的交谈  
我看见他们脸上  
布满了与生俱来的寂寞

### 一位诗友

你终于放过了自己  
像天空放过了雨水  
像灵魂放过了肉身  
又像你父亲  
在潮湿腥臊的码头  
放过了离开岛屿的你  
今天，在你老家旧屋背后  
空旷的旱地，植物稀疏  
却没有放过你  
诵读诗歌时  
伊鸣散乱的声音

### 浮叶村的石屋

无数小小的石屋  
隐藏在一处小渔村里  
无数小渔村像草叶一样，浮在  
广大、澄净的海面上  
每一座石屋，每天  
都会浮起一个广大、澄净的早晨  
今天我相信  
曾经在这里，无数个早晨  
是从一座座石屋里  
从铜镜一样  
微茫的石壁上生成的

## 学者长风

□杨健民

著名历史学家、中国汉唐宋经济史家、厦门大学教授杨际平先生，于2025年8月6日辞世，享年88岁。他的胞弟杨际岚先生（《台湾文学选刊》原主编）告诉我这个消息时，我不胜唏嘘。

我和际平先生接触并不多，已阔别多年。当年我在《福建论坛》工作时，曾去厦门大学向他约稿。际平1938年出生在福建平潭，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。先后在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、湖南零陵三中、零陵一中工作。为了调回福建老家，1978年，他以40岁“高龄”考入厦门大学历史学系，师从韩国磐先生攻读硕士学位，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。

际平先生儒雅而谦逊，话语不多。据说他的硕士论文答辩持续了一整天，有同学全程旁听了他的答辩，惊讶于有点口吃的他，居然能滔滔不绝，口若悬河，对所研究的汉唐经济史与土地制度、赋役制度及出土文献了然于心，了如指掌。

际平先生的学术研究注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，运用量化方法考察敦煌吐鲁番文书，提出均田制土地还存疑等创新观点。他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历史研究》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，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。2016年出版三卷本《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》，2024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百年庆典“师泽如光纪念章”。

我读了曾经与我福建社会科学院的同事、后任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教授谢重光先生追忆杨际平的随笔《我的师兄杨际平》。他赞赏际平先生修为高蹈，做事低调，忘情于名利，不善于运作，只专心于学问，50多岁时才评上教授，60岁生日前一个月才评为博导。早在读研究生之前，他已经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了两篇论文。他的硕士论文洋洋十六七万字，著名学者王仲荦教授评审时的评语是：“不少问题可为定论。”

提起博导之名，如今30出头的年轻人当上博导比比皆是。然而，由于学界弊端，一些深具学术成就之人，一直评不上博导。我的师兄俞兆平先生，都已经出过数册学术专著，也是到了50多岁时才评上教授，后来才当上博导。而他近80岁时出版的《哲学的鲁迅》，于学界扔下了一块巨石，反响强烈。兆平先生担任《厦门大学学报》编辑部主任时，时常请际平当审稿人。他这样说：“所有审稿人的评语都没有像际平写得那么认真、详细，有一次写了整整三张。而对于际平自己投来的稿件，我都让不用审，因为他的学术良心和为人，对得起每一篇论文。”

我在福建社会科学院的另一位同事，后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博导黄克剑教授，在马克思、西哲和中哲领域极有建树，在权威期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。他潜心学问，淡泊名利，从未申报过任何课题，也从未参加过任何学术评奖。按照相关的博导遴选条例，没有课题项目及学术奖项的，不能当博导。他淡然一笑：不能当就不当了。结果有领导发话了：如果不给他评上博导，我们对全国哲学界都交代不过去。

2018年，我在澳门理工大学遇到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孙正聿，同年他72岁。他说他41岁才考上研究生，才开始做学问。自此他一发而不可收，发表了200多篇论文，其中在学界顶刊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（中英文版）和《哲学研究》分别发了十几篇，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了十几篇。

上述几位我认识的大教授都是具有学者长风之人。学问不在早晚，而在于恒心和毅力，在于收拾精神，并归一路，在于用功之深，穷理之熟。这些学者不看重荣誉、年龄和学术环境，其学术人生就是“奔袭”二字。据谢重光教授介绍，杨际平教授的住房，从当年的全家五口挤在一个房间，到后来的80多平方米一小套，他都安之若素，从不羡慕别人的豪宅大第。他没有专用的书房，在客厅一个角落摆上电脑，就算是他的工作岗位。然而，就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里，他生产出全国一流的学术成果。

我在谢重光教授的追忆文里，看到一张借书卡。这是杨际平教授的导师、历史学家韩国磐教授的《南朝经济史》专著，借书的有陈明光（历史学教授、厦门大学图书馆原馆长）、韩昇（韩国磐教授之子、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）、杨际平等四人，其中际平教授借了2次。这张借书卡让我感到，鼎鼎大名的大历史学家的一册专著，借阅者寥寥无几，当代学界的萧条景象可见一斑。

1990年3月间，我在写作《中国古代梦文化史》时，某一日到我供职的福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借书，无意间看到一套36册由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道藏》，就一本一本抱回家翻阅。直至写作这篇短文的今天，我托人去查了下，这套书的借书卡至今还是我一个人的借阅记录。

《道藏》是道教文献的大集成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。其中收录了号称黄帝撰著的《道德经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道家诸子的名著和各种注本，以及道教教义、科仪、符录、仙传、山志等大量文献，乃至“儒书、医书、阴阳、卜筮、诸子百家皆与焉”。

话说回来，若不是专门的学术研究需要，大概是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这套书的。我也是为了寻找其中记录的道家梦占和梦例，才去翻阅它的。我的朋友、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、著名道教文化专家詹石窗教授，乃国家“十三五”规划文化重大工程《中华续道藏》首席专家。这个“续道藏”工程浩大，估计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用到它。但我希望撰这套书的学者，同样是长风破浪，直挂云帆。